

● 西方马克思主义

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

王 雨 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政治系, 湖北 武汉 430064)

[作者简介] 王雨辰(1967-), 男, 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政治系教授,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技术理性批判, 二是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三是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 四是树立新的需要和幸福观念。通过正确处理劳动、消费、需要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体系, 是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科技观和生态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生态伦理; 技术理性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批判; 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4-0428-07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 使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问题, 引发了人们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及其价值体系的反思, 从而形成了生态伦理学。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得较多的是西方现代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自然主义)的生态伦理, 这两种生态伦理尽管具体理论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但是其共同点是脱离社会政治制度及其生产方式, 停留在从抽象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层面上, 探讨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途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 则分别从哲学世界观、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消费主义文化及生存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科学地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理论得失,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本质,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生态伦理价值体系。

—

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 是建立在对作为西方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近代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它是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发端, 为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继承, 并发扬光大。

卢卡奇指出, 脱离“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研究自然物质世界, 这实际上是一种旧唯物主义哲学, 并没有把握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真谛。他认为, 在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那里, “自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就是说, 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 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 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 因此, 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始终都是受到社会制约的”^[1] (第318-319页)。因此, 自然的发展状况实际上是由社会发展的状况所决定

的,而把社会和自然联系起来的中介就是人类实践。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问题的产生具有必然性。首先,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看,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人就陷入被物所支配和奴役的异化状态;其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从而导致理性变成技术理性,反过来成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进而也必然导致纳入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自然的异化。问题在于,“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何演变为“技术理性”的呢?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其根源就在于西方传统的哲学世界观中,特别是西方近代的启蒙理性中。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他们指出,近代启蒙运动的主旨在于把理性从神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2](第1页)。近代启蒙理性认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人,就在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这里他们所讲的知识并不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概念和观念,而是指作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技术。由此一切有关实体、存在、生存、实质、因果性这样一些概念都因其超验的性质而被视为形而上学,从而被逐出科学的领域。凡是不可预料和利用的东西,启蒙理性都认为是可疑的。由此世界仅仅被归结为量的形式方面,启蒙理性以形式的抽象统一原则来把握世界,数学化、标准化、实用化成为了启蒙理性的标志。其结果是启蒙理性不仅没有使人们从神话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走向它的反面,带来了新的神话。因为启蒙运动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并将知识归结为技术以来,人们相信只要凭借着科学技术理性,不仅可以从宗教神学和自然崇拜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依靠科学技术,通过征服自然,而成为自然和宇宙的主宰,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神话。这种以工具性为特征的启蒙理性既造就了理性的异化,也导致了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的支配,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2](第28页)。可以说,正是由于人把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并要求通过控制自然,使自然成为满足人自身需要的工具,才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生态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易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进一步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追溯到“控制自然”的西方传统哲学世界观中。他指出,这种“控制自然”的观念首先起源于基督教世界观中。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其结果是“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3](第28页)。基督教的这一传统在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的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模仿所有神性的工作,并且完善、改进和提高下界自然的工作。所以,在这种贯穿自身的人的行为方式中,人的力量几乎完全等同于神性的力量”^[3](第32页)。而培根则更加清楚地论述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从哲学世界观上对这一观念予以确立,强调“人类的技艺和知识是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其命令的武器”^[3](第53页),使得人们把控制自然的能力和人类能力的发展看做是一回事,“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支配现代人行为的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控制自然’的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剖”^[3](第71页)。莱易斯同时也强调,“控制自然”实际上和控制人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因为通过技术进步控制自然,必然会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从而影响和支配人们的生活世界。问题在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都会遭到自然的反抗。因为一方面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并非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一旦人的内在非理性欲望爆发超过了自然的界限,自然界必然要进行报复,这决定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应该学会尊重自然。但是,在西方“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支配下,特别是在资本无限度追求利润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进一步加剧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加剧生态危机。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近代启蒙理性强化了西方哲学世界观中存在的“控制自然”的伦理价值观,使科学技术理性盛行,从而导致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异化。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批

判了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要求用辩证理性代替技术理性,实现社会和自然的总体解放。而真正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仅仅靠实现抽象的哲学世界观的改变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打碎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人所遇到的自然界是为社会所改造过的自然,是服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的,这种合理性越来越变成技术的、作为工具的合理性,并且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4](第 145 页),只有通过利用技术方面的成就,把人与自然界从为剥削服务的破坏性滥用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向人们许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广告、大众新闻媒体等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把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引到商品消费中,把商品消费等同于幸福本身,淡化和弱化广大群众的政治意识。而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说,科学技术已经沦为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这是因为:

首先,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迅速增加,资产阶级利用大众新闻媒体和广告,引导人们盲目地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在全社会范围内制造一种和人的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这种“虚假需求”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而是“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5](第 6 页)。它主要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和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等等。在这种“虚假需求”的牵引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和自身自由、解放直接相关的真实需求,表现为政治意识的不断淡漠和弱化,科学技术实际上充当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

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理性盛行,整个西方社会盛行工具性的实证思维,使人们形成一种程式化的思维方式,越来越屈从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体系,丧失了人所固有的批判向度,由此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在这种型式中,那些在内容上超出了既定言论和行动领域的观念、渴望和目标,或被排斥,或被归结为这一领域的几项内容”^[5](第 12 页)。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无对立面的单向度社会,人也成了畸形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生产的目的和本质是为了资本追求其利润,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会改变其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还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宣传和提倡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不断地强化社会和人的片面畸形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意识形态工具之所以要不断地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其目的在于支配和牵引大众的消费需要,并使这种消费需要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方向,这也决定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这是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如何提升人的价值追求和全面发展,而是把文化看做是能够带来利润的特殊商品,其方式就是通过广告、社会舆论等控制和改变人的消费选择,倡导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使人们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完全寄托于商品消费中。而工人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状态,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就到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和商品消费中寻找幸福,由此必然产生一种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就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6](第 494 页)。异化消费并不能使人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证,因为它并不是人的真实需要,其内容和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资本发展的需要。异化消费也必然会进一步强化消费主义的生产方式,加重自然界的负担,强化业已存在的生态危机。

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生态危机的产生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借助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巨大增加,通过广告等大众新闻媒体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使人们的政治意识日益淡漠,而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商品消费中,造成了“异化消费”。为了满足人们的“异化消费”,就必须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以此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资本不断追求利润的本性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规模具有不但扩大的趋势,但是自然却无法进行自我扩张,这决定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必然会不断地走向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资本

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利润既是资本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每一个资本主义机构和每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自然却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自然界虽说在限制人类生产的同时,对人类来说远不是吝啬的,它的确给人类生产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但是,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7](第16-17页)。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呢?

三

面对日益严重的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莱易斯认为,存在着应付危机的两种办法:其一是尽可能长期地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把人们的一切愿望和追求都引向消费领域。但是生态及社会制度的限制决定了这种办法难以实现,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由于许诺满足范围的减少引发人们的精神焦虑。同时,要维系这种生活方式必然需要更富压制性和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方式。其二是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拘泥于商品消费的生存方式相反,鼓励人们去更直接地参与各项与满足需要有关的活动,从而改变社会政策和投资的方向,力图应用能源耗费少,物质资源需要不多的办法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要用“稳态经济”代替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二是要改变生产、消费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价值观。这就要求重新评价人的物质需求对于人生存的意义,并大大削减这种物质需求。

所谓“稳态经济”就是指既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生态系统,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的发展,使“人类满足的前景必须根置于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活动和决策的领域,使各个个人能在其中锻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6](第475页)。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实现“稳态经济”呢?莱易斯指出,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着有关“稳态经济”的论述和传统,这一传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稳定化,因为人们在自我实现的机会方面和生活愉快的程度方面的差异,并不能通过物质总量的增加来改变,而只能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组织来改变;二是由傅立叶、马克思、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所论述的“稳态经济”,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独立存在的意义,要求通过正确解决劳动与消遣、闲暇活动的关系,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把需要的满足建立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消费过程中,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真正满足具有丰富的意义。莱易斯则要求将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他指出,商品交换本身并没有什么邪恶,因此并没有什么理由去消灭商品交换本身,需要消灭的是使消费成为满足需要的惟一方式的商品交换。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处于异化的状态就在于人们完全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这导致了工业生产的日益集中和人们对它越来越强烈的依赖,阻碍了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发展,因此必须提出社会替代方案改变人们的这种异化生存状态,而这种社会替代方案的本质和目的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有意识地舍弃集中生产的某些值得怀疑的“效益”,从而改变个人对庞大的工业经济制度结构的依赖,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改变当前人们集中于能源密集型的城市生活。同时这种改变也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个人都采用一种特殊的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运用现代科技的创造能力用于更公平的分散物质和文化成就,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最终创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在这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并非总是衡量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其本质在于要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改变社会政策的方向,改变以占有和消费商品量作为评判幸福的标准,使满足需要的问题不再完全看做是消费活动的功能。

另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阿格尔则强调,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和工业生产体系,以实现其向广大群众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的许诺。但是,日益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不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要和爱好,它是通过高度调节和操纵消费者实现其管理的,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把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决策

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在资产阶级大众新闻媒体的牵引下,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把幸福和自由寄托于劳动之外的商品消费和闲暇时间中,由此形成一种对经济不断增长的期望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应享意识”,从而导致公众对这种生产体系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限制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决定了日益集中的生产和管理体制是无效的,本·阿格尔把这称为“生态命令”。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代之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方式。

本·阿格尔同时也指出,要使人们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最关键还在于树立新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观念。实际上,生态危机已经为人们树立新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观念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这是因为,生态限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难以为继,资产阶级对大众所作的不断提供商品的许诺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破灭感,本·阿格尔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所谓“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是指:“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真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评价”^[6](第490-491页)。正是这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促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工业文明,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本·阿格尔把人们摆脱异化消费的过程分为三个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品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生态危机的加剧将需要人们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不再把劳动看做是获得用于未来商品消费的源泉,而是把劳动看做是实现其价值的方式。通过这种价值观的转换,把人们对自由和幸福的确证置于劳动过程中,才能使他们重新评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力图改变这一社会,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四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技术理性批判。通过这种批判,他们将当代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首先归因于以“控制自然”为特征的西方哲学世界观。在他们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教义,并通过近代启蒙运动从哲学世界观上予以确立,从而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把人看做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把人类的使命归结为不断地认识自然,进而控制自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其二是资本主义制度批判。通过这一批判他们认为,生态危机之所以得不到根本的根治,甚至是越来越严重,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人类本质力量象征的科学技术必然反过来成为支配和奴役人的工具。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和本质就在于保护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整个社会和人的发展向度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需要,完全受资本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不可能真正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人类,而只能是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需要,“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异化为了“阶级中心主义”。因此,要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为人类谋福利的工具,就必须首先打碎资本主义制度,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取而代之;其三是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批判。通过这种批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故意制造出来的,其根本目的在于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使广大群众沉醉于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异化消费中,弱化其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当代生态危机;其四是树立新的需要和幸福观念,使人们从受支配、被牵引的需要中解放出来,把对幸福的追求和确证建立在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而不是异化消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牵引下,人的需要并非是由于人的真实意愿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完全由消费主义文化所制造出来强加于人的,人的心灵世界实际上已经处于被支配和被控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逃避到商品消费中去寻找心灵

的慰藉,去体验为逃避异化劳动的所谓幸福。而实际上这种被支配的需要和幸福既无法使人们实现自己的自由和价值,也必然会加剧生态危机。以上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完整内容。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相对于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特质是什么呢?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又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对于这些问题,以下我们通过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和西方生态伦理的区别来加以简略的分析。

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包括“非人类中心论”和“现代人类中心论”生态伦理学两种类型。“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当代世界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人类中心论。因为在“人类中心论”看来,人是宇宙中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人的需要,因此只具有相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只有人与人之间构成道德权利义务关系,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及其存在物则被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其结果导致科学技术的滥用。“非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以功利主义伦理学、康德道义论伦理学以及现代生态学的系统理论为基础,相继提出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论证人之外的生物及自然存在物也具有内在价值和权利,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此对应,“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伦理既反思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的自我观念和需要观念,但同时也指出如果生态运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捍卫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的动力和基础。因此,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不仅不在于是否承认人之外的生物及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而在于立足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彻底贯彻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虽然都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传统人类中心论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科技理性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但是他们都脱离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历史条件,抽象地考察科学技术的作用,并把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为“是走出人类中心论还是走入人类中心论”的抽象价值争论上。这种争论虽然有利于人类认识人类行为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问题,但是却无法真正解决生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在资本主义框架范围内寻找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而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分析西方社会的现实,始终坚持把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他们也并不否定技术发展的必要性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性,只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必然会异化为统治和奴役大众的工具,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会演变为“阶级中心主义”,人的需要必然不是自主的、合理的需要,而只能是被资本所控制、所支配的需要。因此,生态问题、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摆脱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的支配,正确处理劳动、消费、需要与幸福之间关系。应该说,其理论更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更深刻地揭示了生态问题的本质。

还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有利于我们建立非西方中心论的发展观、科技观和生态观。从发展观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说明:发展虽然是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基础的,但是真正意义的发展实际上包括物质文明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这两个向度,如果人们沉醉于商品消费中,并以此作为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的话,那么这种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粗俗化、感性化、商品化的现象和这种异化的发展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发展。从科技观的角度看,由于全球性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西方出现了以反思和批判理性以及科学技术的所谓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学术界也出现了一股敌视科学技术、夸大科学技术副效应的反科技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表明,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什么价值属性,其作用方向实际上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反科技思潮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若干非理性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从生态观的角度看,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目前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在这些学科争论的最基本问题就是到底应该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应该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争论的过程

中,不少论者认为应该放弃“人类本位”而代之以“生态本位”;也有不少论者在坚持“人类本位”的同时,认为在生态问题面前,“人类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地区利益”,因而主张用“全球伦理”代替当前人类的伦理价值观。应该说,这些争论对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是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借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在捍卫“人类整体利益”口号下,不仅不承担其保护生态环境应有的责任,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国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所揭示的,在目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条件下,在生态问题上,放弃民族利益而实施“全球伦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只会导致本国更大的生态灾难。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不应忽视本国的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对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全盘接受,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和人类历史的发展现状,创立超越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生态伦理,以指导制定本国的生态发展战略。

[参 考 文 献]

- [1] [匈] 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德] 霍克海默尔,阿多诺. 启蒙的辩证法[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3] [德] 威廉·莱易斯. 自然的控制[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 [4] [德] 马尔库塞. 西方学者论 1844 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5] [德]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 [6] [加] 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7] [美] 詹姆斯·奥康纳. 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Western Marxist Ecological Ethics

WANG Yu-che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Poli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Wuhan 430064,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Yu-chen (1967-), mal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Poli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Law, majoring in 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Ecologic Ethics of western Marxism consist of four aspects: 1.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reason. 2.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institution. 3. The critique of consumptionist culture and existential mode. 4.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demands and new ideas of happiness. To get rid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fundamental way is to correctly cope with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bor, consumption, necessity and happiness, and to transform capitalist production system. At last by comparison, this thesis explains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those of other western philosophies, pointing out its important value to establish correct ideas of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 and ecosystem.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ecological ethics; critique of technological reason; critique of capitalist institution; critique of consumptionist culture and existential mode